

“三星堆遗址考古成果在世界上是叫得响的,展现了四千多年前的文明成果,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、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相互影响等提供了更为有力的考古实证。文物保护修复是一项长期任务,要加大国家支持力度,加强人才队伍建设,发扬严谨细致的工匠精神,一件一件来,久久为功,做出更大成绩。”

——习近平总书记在三星堆博物馆新馆考察时指出

四川大学博物馆馆长、教授霍巍解读“三星堆之谜” 曾与中原文明并存,后融入中华文明之中

7月27日起,三星堆博物馆新馆开始试运行。别具匠心的场馆吸引了世界的目光,文物将如何入驻新馆,留给观者极大期待。

中国考古学会成员,四川省考古学会首任会长,四川大学博物馆馆长、教授霍巍告诉华西都市报、封面新闻记者,往前回溯,三星堆文化曾经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;再往后望,它消融在了更大的、统一的、以中原文明体系为特征的文化圈里。

这一切都说明了,三星堆文化不仅不是孤立的,它更是在与其他文化交流的过程中,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一脉,也是中华文明形成过程的见证者。

早期三星堆文化或与二里头有交流

要了解三星堆文化受到了哪些文化的影响,首先要明确一点:三星堆祭祀坑的年代并没有覆盖到完整的三星堆文化时期。根据碳十四测定年代数据,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青铜器物,存在时期大致从商代末期延续到西周初年。

而三星堆文化则是更广泛的概念。三星堆文化从距今4500年前,也就是其存在的早期,一直延续到晚期,也就是祭祀坑存在的年代,甚至可能再长一些。虽然现在关于三星堆文化早期的材料较少,但可以确定的是,在三星堆文化的整个发展期间,它并非是孤立的。“它在不同发展阶段,与不同时期的周边文化都有交流。”霍巍说。

“三星堆一期文化的时间,与成都平原的宝墩遗址、德阳的桂圆桥遗址时间差不多。目前这段时期出土的文物较少。它大致能够与三星堆青铜文明时代分为两段。”霍巍介绍,仓包包祭祀坑出土的镶嵌绿松石的青铜牌饰,就是早期三星堆文化青铜时代的器物之一。

仓包包小城位于三星堆遗址的东北部,仓包包祭祀坑则位于仓包包城



三星堆仓包包祭祀坑出土的青铜牌饰与二里头青铜牌饰有相似特征。



出土于三星堆二号祭祀坑的铜圆尊。

中部内侧。出土于这里的铜牌饰上镶嵌了数个绿松石。因为它的造型与中原地区、西北地区的铜牌饰有相似之处,曾引起学界的讨论。

虽然目前对于该铜牌饰究竟是受到了哪种文化的影响,学界尚不统一,但诸多学者已经达成了共识,该铜牌饰的确受到了其他地区文化的影响。对此,霍巍认为:“铜牌饰与二里头青铜牌饰有相似特征,可以与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镶嵌绿松石牌饰作比较。我们认为,从二里头时期开始,中原文化已经有可能从西北方向的陕西宝鸡、城固一带传入三星堆,并产生了影响。”

青铜器印证与中原文化的联系

与中原文化的联系,在三星堆文化晚期形成的八个祭祀坑内,得到了更明显、确切的印证。

《周礼》中有记载:“辨六尊之名物,以待祭祀宾客。”“凡祭祀社稷,用大罍。”尊与罍,是中原文明典型的礼器。自第一次发掘以来,三星堆遗址出土了不止一件与尊、罍相似的青铜器。出土于一号祭祀坑的2件圆尊,二号祭祀坑的8件圆尊,以及最新一批发掘出的青铜大口尊、腹部饰有饕餮纹的圆口方尊等,都是三星堆文化与中原文化交流的证据。而其他青铜器的顶尊、背罍的造型,更像是古蜀人对于“尊”的认识和阐释。

“三星堆人显然知道这是礼器,他们也将它作为祭祀的重器来使用。”霍巍说,不同的是,古蜀先民在这些礼器中融入了自己的信仰与想象,制造出了不同造型的青铜器。

霍巍介绍,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器的形制、纹饰,同样印证了与中原文明有着密切的联系。青铜器上的云雷纹、夔龙纹、兽面纹、回纹、勾云纹等等纹饰,也是中原文明青铜器的典型纹饰。

除了能够体现与中原文明交流的青铜器外,三星堆遗址同样出土了具有独特性的青铜器物,例如青铜神树、青铜祭坛、青铜人头像、青铜大立人等

等。这些青铜器属于三星堆独有的青铜文化体系,包含了古蜀先民的观念意识、祭祀的神话传统等。

除此之外,霍巍还指出,三星堆青铜器的技术体系,也与殷墟出土的青铜器有可比之处。例如,三星堆青铜器的铸造中使用的高放射性同位素铅,同样的技术只在中国青铜器制造的部分地区出现,比方说殷墟遗址,以及陕西、长江中游的一些地区。“这并非偶然。”

独立发展又受中原文化强烈的影响

“巴蜀地区的古蜀先民吸收了来自中原文明、周边长江流域荆楚地带的很多文明成就,再与自身的观念、审美意识、技术体系融为一体,创造出了具有独特传统的三星堆青铜器。”霍巍这样看待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器。

而关于当时三星堆文化如何与中原文化交流,霍巍教授作出了如下的推测:“可能是黄河流域地区以殷墟为代表的中原文明,通过长江中游地区传播到了长江上游地区。也有学者认为北方也存在一条传播通道,比如通过今天的陕西传入四川,这也是商周时期的重要传播通道。所以三星堆文化从南北两个方向,都可能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。”

既然三星堆文化已经具有了与殷商文明,尤其是商代晚期中原地区的青铜文明进行密切交流的能力,那应当如何认识三星堆文化?霍巍概括道:“三星堆文化是独立发展的,它具有自己的文化传承体系和风格。但同时,它又吸纳了大量包括中原地区、长江中游地区在内的文化因素,受到中原文化强烈的影响。最终,三星堆文化在经历了自身发展的高峰后,于战国秦汉时期,消融在了更大的、统一的、以中原文明体系为特征的文化圈里。”

华西都市报·封面新闻记者 刘可欣
图据三星堆博物馆官微

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探秘三星堆博物馆新馆 古蜀人精神世界的解读需要尝试

7月27日,三星堆博物馆新馆开始试运行,文博爱好者争相前来打卡。在人头攒动的展厅,记者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: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、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。探馆伊始,王巍也格外期待:“很多三星堆文物出土的时候,我都在现场,但当时有些文物还没有修复,我特别希望看到它们修复后的样子,包括龟背形网格状器,还有顶尊跪坐人像青铜器。”

龟背形网格状器外侧为网格状椭圆形,分上下两层,结构非常精巧,内有一个背部驼起的椭圆形完整玉器,材料呈现青绿色,玉料极为罕见。据介绍,该器形在三星堆甚至整个中国青铜时代,都属首次出现。它不仅是“镇坑之



王巍探馆三星堆博物馆新馆。

宝”,甚至在三星堆迄今为止出土的文物中也堪称神品。

在博物馆,王巍指着这件期待已久的国宝说:“因为锈蚀在一起,网格还不能打开。当时出土的时候,我们还在想

里面会不会有文字?会不会有刻符和图形呢?非常值得期待。”

王巍介绍,最新发掘的文物当中,一个玉琮的表面有两种神树的形象,跟眼前这棵青铜神树的造型都不一样,“说明在当时人们的观念中,神树有不同的样子,不同的神树应该有不同的功能,古蜀人的思想太丰富了,也给我们带来了新的研究课题。对古蜀人精神世界的解读需要尝试,没有文献记载,只能从它的形象进行解读和研究他的信仰体系。”

参观过新馆,王巍的感受是:非常震撼,第一,规模这么巨大;第二,没有想到最新发现的文物能够这么快地展示出来。王巍评价:“这开创了一个史

无前例的速度,非常可贵。比如发掘的那些神坛很多都是局部的,现在通过3D打印的形式让我们看到整体,这太可贵了,我都是第一次见到,民众真可以大饱眼福。神坛整体3D打印出来,我觉得太震撼了。这几个神坛包含着丰富的思想内容,我觉得是最吸引人的也是最神秘的,给学者留下不同的研究余地,给广大观众充分的想象空间。”

华西都市报·封面新闻记者 吴德玉 摄影报道